

王子今 孙家洲◎主编 马利清◎执行主编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论文集

Essays on the Excavated Documents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子今 孙家洲◎主编 马利清◎执行主编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Essays on the Excavated Documents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文集 / 王子今, 孙家洲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3 - 1661 - 3

I. ①出… II. ①王…②孙… III. ①文化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947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之一 …… 孙兆华(1)
-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之二 …… 田家溧 刘自稳(4)
-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之三 …… 山 珊 孙思贤(12)
- 论清华简《厚父》应为《夏书》之一篇 …… 郭永秉(22)
- 读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 …… 邬文玲(41)
- 里耶秦简所见迁陵三乡补论 …… 鲁家亮(51)
- 里耶秦简中“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 赵瑞民(72)
-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喜”的官历 …… 陈侃理(77)
- 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告》与《史记》纪事抵牾
释解 …… 孙家洲(85)
- 睡虎地秦简《效律》考释一则 …… 山 珊(92)
-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简牍概述 …… 张春龙 张兴国(106)
- 悬泉汉简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 …… 张德芳(111)
- 西汉简牍文书所见职官长史识小 …… 张俊民(130)
- 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
——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
考察 …… 王子今(142)
- 说“鉞庭” …… 孙兆华(169)
- 说书檯 …… 马 怡(181)
- 先秦巫者的祝诅放蛊活动 …… [韩国]赵荣俊(190)
- 论秦汉时期户籍概念与户籍实体的对应关系 …… 韩树峰(205)

- 二十等爵确立与秦汉爵制分层的发展 孙闻博(226)
- 《汉书·景帝纪》“訾算十”“訾算四”新论
——关于西汉前期一条经济史料的辩证 石 洋(239)
- 匈奴与拓跋鲜卑毁镜习俗之比较研究 马利清(246)
- 也说“伊循” 陈晓露(260)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学术研讨会综述之一

孙兆华

由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协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6月6—7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简牍博物馆、陕西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科研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来加深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是此次研讨会的主旨。

出土文献与遗址发掘收获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意义重大。王子今指出士卒赏卖衣财物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西域“贾胡”可能对这些商品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作用，河西毛织品的发现可增进对丝路贸易的认识。张春龙介绍了益阳兔子山遗址的发掘和保护，概述了九号井楚简等的情况。郑同修介绍了定陶汉墓的发掘和保护，特别指出了墓葬封护用砖上和黄肠木上两类文字资料的学术重要性。张德芳揭示了悬泉遗址所出汉简对于研究两汉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清华简的刊布对于古史重建和古文献解读学术价值巨大。李均明、赵平安分别对《殷高宗问于三寿》《汤在啻门》展开讨论。曹峰认为要判断前者的文献性质，既重神事又重人事，强调天人感应，应是一条重要线索。杨振红对《蟋蟀》及《鸛鹑》、郭永秉对《厚父》与传世文献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史党社通过《系年》等材料对秦人来源问题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梁涛对荀子“其善者伪”的见解、李锐对古史系统的新探索和董珊对新见吴王剑铭的考证，也颇具新意。

传世文献所涉及的户籍、赋役、职官等制度，多有缺失。学者们基于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制度进行了新的考察。张荣强讨论了目前所见最早纸本户籍《前秦建元二十年籍》里的“丁中”标准问题。孙闻博利用里耶秦简等材料认为，“吏徭”以受差使而外出从事吏务为多；徒隶“行徭”，亦主要涉及临时征调而外出服“正役”，以及地方官府役使而外出服各种供奉、差使类杂役。秦及汉初或存在以“傅”划分大、小的方式。李力、石洋讨论了“稍入钱”、秦汉算赋演变的问题。此外，刘乐贤、张俊民、赵凯、李迎春和孙占宇等多位学者利用西北汉简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利用最新的出土文献资料，可以在新的视野中探讨中国古代政治、行政与法律诸方面的问题。孙家洲指出秦简牍《秦二世元年文书》、北大竹简《赵政书》与《史记》对于秦二世记事的抵牾之处。陈侃理考察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小吏“喜”的仕宦经历。鲁家亮利用里耶秦简探讨了迁陵县三个乡的自然环境和空间位置。宋杰、刘太祥和刘庆则对秦汉法律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韩树峰认为汉吴户籍只能指一种簿籍，是名数的组成部分，但名数不是户籍。汪华龙考察了晋辟雍碑碑阴的“凉州散生”相关问题。

在名物、数学与学术史方面，马怡考证了简牍时代的“书櫝”这种用来借承与收装书籍用具的形制与用法。邬文玲对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释文提出新的解读意见。刘瑞对超长纪年的最新探讨，冯玉对于岁首七日俗信的新见，赵容俊对秦汉中国医学基础理论确立的考察，张倩茹对古代选择术“上朔”日演变过程的研究，也值得关注。还有，赵亮亮考察了西汉《杨量买山石刻》的发现史和研究史。森谷一树则回顾了日本对中国西北出土简牍的研究史。蔡万进就出土文献概念的形成与界定、出土文献与历史学等方面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张忠炜除了讨论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还提出要关注简牍在墓葬埋藏空间中的位置等问题。

总之，此次研讨会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平台。利用出土文献来研究古史与古文献、中国古代制度史、政治与法律史、学

术史等方面在会议中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今后这种立足于学术前沿的研究路径必将得到继续发扬。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学术研讨会综述之二

田家溧 刘自稳

2015年6月6—7日，由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协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家洲教授主持开幕式，来自北京、上海、湖北、甘肃、陕西、湖南、河南等地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并做相关学术报告。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献资料相继面世，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规章制度、民众日常生活、社会精神风貌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丰富资料，也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如何更好地运用出土文献资料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会议先由王子今、张春龙、郑同修、张德芳四位先生做了主题发言。王子今《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认为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多与士卒赏卖衣财物相关，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活跃西域“贾胡”可能也对这些商品继续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此可增进对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张春龙《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简牍概述》介绍了益阳兔子山遗址简牍发掘和整理情况，概述了益阳古城的历史地位以及出土简牍和砖瓦、陶瓷等其他遗物遗迹的研究价值，特别是首次展示了七号井和九号井部分简牍图版和释文。郑同修《定陶汉墓与古文字发现》介绍了定陶汉墓发掘的主要情况，并认

为墓葬为西汉晚期，属于汉王朝国家储备即“预作寿藏”产品。故墓葬主人不会是定陶王，最有可能是汉哀帝为其母丁太后所建。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丝绸之路和中西关系》关注悬泉简中与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相关的记载，根据其中的里程简恢复了丝绸之路东段从长安到敦煌的具体路线，并分析了悬泉简中反映的丝绸之路中段、西段西域诸国情况。“丝绸之路”很早便进入研究者的视域范围，但对其经济功能及文化交流的考察，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王子今先生和张德芳先生的研究，或可为今后该方向的研究提供一种参考。

本次会议采取分组报告与讨论的形式进行，现将主要内容综述于下。

一 古史与古文献研究

新的出土文献对解读传世文献文本及内容很有帮助，同时对传世文献记载所缺乏的古史系统的梳理也大有裨益。李均明《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利”说解析——与荀子义利观的比较》认为《三寿》“利”说是追求利益平衡的纲要，是其行事原则“揆中水衡”思想在利益分配中的体现。虽然《三寿》“利”说内涵与孟荀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趋向相同，应是当时利益观主流。杨振红《清华简〈鸛鸣〉〈蟋蟀〉的解读及〈诗经〉相关问题探讨》认为根据简本《金縢》看，《鸛鸣》显然是周公怨诗而非周公东征后报成王之诗，汉代四家诗解读皆不得其旨。简本《蟋蟀》的主旨是“康乐而毋荒”，与《左传》时代相吻合，但汉以后《蟋蟀》则旨在刺君俭。由此可推汉代《诗》《书》大约来源于一个相同的祖本，只是在传承过程中产生若干的小差异。这个祖本与简本时代的文本已有相当的距离。赵平安《“地真”、“女真”与“真人”》一文，结合清华简《汤在啻门》的“地真”，将《楚帛书》中的“女填”解读为“女真”。《楚帛书》既然有“女真”这类道家特色的表述，折射出的也可能正是它的学派倾向。史党社《新出文字资料与秦人早期历史》结合清华简《系年》篇与传统考古材料，对学界传统的秦人来源“东来说”提出了一些疑问。清华简《系年》与《秦本纪》之间尚有矛盾存在，呼吁学界对此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曹峰《读〈殷高宗问于三寿〉上半篇一些心得》对《三寿》上半篇文意做了详细解读，并认为该篇是

在探讨长治久安之道，其内容既接近《老子》也接近《易传》，属于居安思危、趋吉避凶之道。郭永秉《论清华简〈厚父〉应为〈夏书〉之一篇》认为，《厚父》完全有可能是在西周流传的夏代传说基础之上编写出来以顺应周朝统治的一篇文章，《厚父》应为《夏书》之一篇。董珊《新见吴王余昧剑铭考证》梳理了余昧剑铭上所记载的王余祭在位期间的四次征伐事件，虽然与传世文献记载不甚相合，但这正是出土文献解读中不应趋同传世文献而应立异的典型。李锐《古史系统的新探索》认为从西周到战国时期至少有四次古史系统转变，其主要转变由周人完成。周人在拉长自己的祖先之同时，尽可能把各区系、各氏族的祖先纳入古史系统中，使之时空合一。梁涛《荀子“其善者伪”为“其善者愆”说——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认为荀子《性恶》篇实际揭示了人生中以“性”为代表的向下堕失和以“心”为代表的向上提升的两种力量，并通过善恶的对立对人性做出考察，实际就是“性恶、心善”说。荀子学说中的心是道德智虑心，具有好善、知善、为善的能力。

文献释读无疑是出土文献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李均明、曹峰、郭永秉先生的研究便是代表。在通读文本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将出土文本同传世相关文献做对比研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其中杨振红、梁涛两位先生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用出土文献纠正我们原本依靠传世文本而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错误认知，对于思想史的重新梳理也大有裨益。但对出土文献我们也需要避免盲目的认同，这正是史党社、董珊先生在文中所强调的：要对出土文献材料有一个理性审慎的态度。

二 制度创新研究

出土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经济、政治、军事等反映国家制度方面的资料。李力《关于秦汉简所见“稍入钱”含义的讨论——以新见岳麓秦简的资料为契机》结合居延简、里耶简以及新见岳麓简中“稍入”文例，将“稍入”“稍入钱”理解为汉代会计账面中所列的常规收支，是汉代社会通行术语。“稍入钱”是政府每月定期收入的固定款项。孙闻博《秦及汉初“徭”涵义新论——兼论年龄分层“小”的所指》强调“徭”这一词语在秦汉社会的具体使用颇为宽泛，包含劳役、屯戍、兵役和罚作，

应对“徒隶行徭”以及“吏徭”现象予以关注。又秦及汉初或存在以“傅”划分大、小的方式，“小”包括15岁以上的未傅籍群体。石洋《〈汉书·景帝纪〉“訾算十”“訾算四”新论——关于西汉前期一条经济史料的辩证》结合新见岳麓秦简认为《景帝纪》中的“訾算若干”的“算”应理解为财产税征收单位，“算”后数字视为该单位的计量额度更为合理。从秦简“訾税若干钱”到《景帝纪》中“訾算若干”的演变很可能是以汉初“初为算赋”为契机发生的。张荣强《再谈〈前秦建元二十年籍〉录文问题》主要对作者此前《〈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一文中张宴一户丁中统计情况进行了部分修订。张俊民《西汉简牍文书所见职官长史识小》依托简牍文书所见的长史资料，探讨简牍与史书所见长史名称的差异、长史官秩、长史如何行太守事、内郡长史及长史人名等，对史书所记汉代职官长史作了一定程度的补充。李迎春《居延汉简所见广陵王临终歌诗及相关问题研究》认为肩水金关241·10号简是关于刘胥临终歌诗早期传抄本，可能是当地人在接受广陵王谋反信息的同时获得的文化副产品。《汉书》中称为“自歌”的广陵王刘胥临终歌诗并非原创，其流传应是朝廷有意传播的结果。并通过梳理《汉书·武五子传》所引刘胥歌诗的可能性来源及其文本流变，加深了理解“缀辑所闻”在班固创作《汉书》中的作用。孙占宇《重读居延新建札记（一）》是“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成果之一，利用最新拍摄的红外线数码照片重新研读居延新简，对该批简牍的部分旧有释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订。刘乐贤《也谈金关汉简中一种与〈孝经〉有关的文献》推测金关简中与《孝经》有关的8条简文可能是出自王莽的《戒子书》八篇。赵凯《西北汉简中的“请诏”与汉代的“请诏”使者》认为“请诏”乃是皇帝派出使者的重要程序，因“请诏”外出的皇帝使者，或可称为“请诏使者”。虽传世文献“请诏使者”案例寡少，但汉代行政运作的特点决定了“请诏使者”的普遍性。

因许多出土文献并不全面系统，所以涉及国家制度方面的研究与考证，则相对困难。在本组讨论中，李力、石洋先生关注会计、税收制度，孙闻博、张荣强先生关注国家徭役、户籍制度，张俊民、赵凯先生关注职官问题。诸位先生从片段的出土文献材料中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并做出相关解读，对学界相关问题研究多有裨益。又李迎春先生通过将肩

水金关简中有关广陵王歌诗的片段同《汉书》相关记载进行对读，从中展示了汉代政府的信息传播方式与效率。这种关注国家文化信息传播相关政策的研究视角，很新颖也非常有启发性。但本组研究大多瞩目于经济、政治制度领域，实则出土文献中有很丰富的反映国家军事制度的相关资料，也应该予以相关关注。

三 政治、行政与法律研究

出土文献中反映国家政治、行政与法律的相关文献也非常丰富。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告〉与〈史记〉纪事抵牾解释》分析了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告》与《史记》就秦二世篡位记载出现的抵牾现象，认为《史记》中所记载的秦始皇——秦二世之际的基本历史叙事框架还不能轻言改写。在政治“铁幕”时代，统治者官方文告中越刻意强调的，大多要从其反面加以思考和诠释。汪华龙《晋辟雍碑碑阴“凉州散生”考——兼谈辟雍碑碑阴的二次添改》对晋辟雍碑碑文作了重新校释，并认为碑文集中出现的凉州散生反映了晋初凉州政策：征召凉州豪右弟子入太学以借此解决凉州问题、重建国家统一。此外推测碑阴题名的二次添改现象与司马伦篡位有关。鲁家亮《里耶秦简所见迁陵三乡补论》论证了启陵津与二春津存在的可能性，考察了迁陵三乡的水路交通情况，以及分析 8—145 + 9—2294 所见三乡次序中暗含的三乡、各官署以及县城之间空间位置关系的蛛丝马迹。陈侃理《睡虎地秦简〈编年纪〉中“喜”的宦历》借助新近出现的材料和研究补正《编年纪》简牍释文，复原喜的宦历，使得我们能够重新思考其与同墓所出简册的关系，同时也为研究秦代基层官吏的升迁途径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案例。山珊《睡虎地秦简〈效律〉考释一则》考证了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效律中关于会计账目失误处罚规定的两则相似简文，厘清了这两则看似相类实则是针对不同适用对象的律文。宋杰《汉代军法中的死刑》系统考察了汉代军法死刑的判决过程、执行地点、处决方式与循众的做法，认为汉朝军法中的死刑规定与审判机构及程序已经相当完备，对于维持军队的纪律、保证战斗行动的正常进行有积极促进作用。刘太祥《简牍所见秦汉行政法的基本特点》总结了秦汉行政法的八个基本特点：

体系完整；内容全面；成熟且可操作性强；注意行政的规范性、系统性和时效性；注重政治体制机制建设；注重“治吏”；严格“理财”；注重礼制。刘庆《也论秦汉司法中的“状”文书》认为“状”文书侧重举劾者对案情的交代，且需要对被劾者身份进行详细说明。在“以文书御天下”的秦汉帝国体制下，文书成为上级实施司法管辖，掌控司法程序的重要手段。故通过对这些司法文书的考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秦汉司法程序及其运行实态。韩树峰《论汉吴简牍中所见的户籍》认为汉代可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宅园户籍”，“年细籍”也不属于户籍，故以汉制推测孙吴户籍有两种簿籍并不妥当。汉吴户籍只能指一种簿籍，不可能是多种簿籍的概称，目前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吴简中登录人口的资料均是户籍。

相关出土文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政府的政务运行以及具体政策，尤其是传世文献记载相对薄弱的地方政府行政与相关政策。韩树峰、鲁家亮、陈侃理三位先生的研究便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如何利用出土文献分析解读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务。但是当出土文献记载的文告同传世文献记载相抵牾的时候，不能盲从出土文献。孙家洲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政府官方文告的思路。法律研究在出土文献研究中起步相对较早，学界已经积累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宋杰先生的研究关注汉代的军法领域，这是以往出土文献法律研究关注较少的部分，研究视野较为新颖，值得借鉴。最后也希望在这些单篇研究的基础上，未来会有更多更系统的关于国家机构政务运行及法律研究的成果出现。

四 名物、数术与学术史研究

出土文献同传世文献相比，最明显的一个优势，便是其中含有大量生动的关于当时社会生活方面的记载，这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材料。马怡《说书櫝》认为书櫝是简牍时代用来籍承与收装书籍的用具，多用木材制成，由于使用的范围和时间有限，故而在史籍中的记载不多见。结合简书的形式和后世帛书挂壁存放方式，认为山东临沂白庄东汉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中间的竖向悬挂物可能是一空书櫝。蔡万进《也谈出土文献》系统梳理了出土文献概念的最终形成

与科学界定，指出出土文献作为文献的一种具有一般文献的属性，同时又丰富发展了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而出土文献作为史料，对于整个历史学科又具有证史、补史、纠史、撰史等方面的功用和价值。张忠炜《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及其他》从学界对随葬书籍的认识出发，回顾了出土文献性质的“镇墓说”和“明器说”。在“名”和“实”两个层面上否定了出土简帛文献明器性质的认识，提出今所见墓葬出土律令文献是战国晚期随葬“镇墓兽”风气骤止后兴起的一种新的镇墓形式，应当是特定时代特定区域下镇墓器的一种。指出出土简牍文献研究应进一步关注简牍墓葬位置、文本抄录和出土文献史料批判等问题。赵宠亮《西汉〈杨亮买山石刻〉的发现与研究》辨析了相关研究论著有关《杨亮买山石刻》发现和流传记述的分歧，在此基础上认为该石刻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重庆府巴县官廨之东，道光十一年被钱安父携至湖州，后归平湖吴重光，咸丰十年石毁。刘瑞《汉代“超长纪年”问题研究》梳理了现有的汉简、钱范中超出史籍所载长度年号的研究情况，总结了学界对超长纪年产生原因的意见，并依据在西安新出土汉代“地节五年”钱范、汉未央宫骨签中的“地节五年”“五凤五年”等超长纪年资料，从逻辑上否定了超长纪年为改元通知未达而产生的可能。森谷一树《日本西北边境出土简牍研究的新动态》介绍近一两年在日本发表的有关居延、敦煌汉简的最新研究成果。文章扼要回顾了日本西北出土简牍研究的历史，介绍了自1990年新简公布以来日本学界的研究旨趣和取得的进展，指出在简牍资料大量公布的时代，日本学界呈现专注于简牍文字信息归纳和简牍文字以外信息解读的两个研究方向。赵容俊《秦汉中国医学基础理论确立的考察》探讨了秦汉时期中国医学基础理论确立的情形。文章认为秦汉的医学虽专门化，但未摆脱巫医杂糅的形态，医疗知识古朴幼稚。通过梳理这一时期的文献材料，经脉学说、脏腑学说、本草之学、针灸疗法、养生之论五方面作为中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邬文玲《读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部分释文提出新见，认为原简当断为“丹所以得复生者，吾（悟/梧）犀武舍人。犀武论，其舍人尚命者以丹未当死……”意即丹所以复生因为遇到犀武的舍人，犀武审判丹之案，其掌管死生判决的舍人认为丹罪不当死。张倩茹《“上朔不会众，沽

舍不触殃”——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视野中的上朔》考察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见“上朔”的异同，认为两者在确定依据、相邻依据、运行模式及与临近日期关系等方面存在不同，但是上朔日的干支、运行顺序及凶日性质反映了传世文献对出土文献的继承关系，这种上朔观念不应当孤立对待而应看作不同时代的总和。冯玉《岁首七日俗信源起新考》总结了当代对岁首七日俗信阐释的三种观点，结合放马滩秦简乙种《侯（候）岁篇》认为岁首七日俗信至晚源起于秦时的占卜，用以预测新年人畜的康健与兴旺，与创世传说没有关系。

在出土文献面世之前，仅借助传世文献的研究，我们很难对古代社会民俗、名物制度以及普通民众的信仰有一个清晰直观并且全面的了解。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与应用，给这方面的历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马怡先生借助画像石来推测汉代书檣的形制与用法，以及张忠炜先生对墓葬简牍功用的考察，便是借助出土文献材料探讨名物制度的范例。邬文玲先生通过点读秦简中的《志怪故事》，则为我们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死观提供了一种新资料。刘瑞先生以及张倩茹同学关注的社会纪年与择日问题，也是欲了解古代中国社会生活所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同时要了解出土文献研究的历史，我们不能只把视野局限在国内的研究，森谷一树先生介绍日本学界简牍学研究的新动态，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学术资讯。

出土文献研究工作自 20 世纪以来已达一个世纪之多，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技术仍在继续，所以学界出土文献研究相关工作仍是任重而道远。本次会议汇集了国内出土文献研究领域众多优秀的专家学者，一起深入探讨了出土文献领域各方向的最新成果与发现，为出土文献研究提供了多种研究方法视角，同时也有助于鼓励后进青年学者继续加入出土文献研究这一工作中来。本次会议获得了圆满成功，相信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会对学界研究大有裨益。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学术研讨会综述之三

山 珊 孙思贤

由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协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6月6—7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地的50多名学者参与了这次盛会。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涉及先秦至魏晋的考古、历史与出土文献研究的方方面面。会议共分为“古史与文献”“制度新探”“政治、行政与法律”“名物、数术与学术”四个单元进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为方便叙述，本文主要根据论文所关注的时段及材料重新归类，分为四组，兹作综述如下。

一 先秦历史与文献

作为近年来先秦史研究领域重要的出土文献，清华简毋庸置疑是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清华大学的李均明在《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利”说解析》一文中，结合传世文献对《三寿》篇中关于“利”的七句话进行注释和解析，尤其是与该文本形成前后孔子、孟子、荀子的观点相比较，认为这种关于“利益”的观点和荀子之说更加接近，也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从时间顺序上看，《三寿》篇中关于“利”的观念更侧重于调整利益，该篇只是一个类似提纲的文本，并未详细展开，而其后的荀子则从人性角度阐发如何调整利益，可以说反映了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发展。关注荀子思想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梁涛的《荀子“其